

中国核心城市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社会学分析 ——基于北京、上海的比较研究

马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一种判断和看法的集中体现,是对外界事物一贯的、稳定的心理准备状态基础上的深层次意识反应。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构成。针对北京和上海在文化发展、城市定位功能性的不同,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让“城中的人”在社会信任的关系中既表现出共同性,也凸显现代化背景下的差异性,这既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嬗变,也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浓缩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信任; 城市青年; 人际信任; 组织信任; 后物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7)01-0041-09

一、研究的缘起及问题

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希望,更是影响社会深刻变化的主要群体,青年的社会信任不但代表了青年发自内心的对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反映和判断,也是透视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态度是一种来自于深层次主体意识对客体的反映,社会信任的客体是社会发展的状况、趋势及表现其特征的社会现象,它是通过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组织等关系构建起来的。青年是这一系列关系的参与者,也是构建者。当从相对单纯的家庭和校园关系走向复杂多面的社会关系时,作为“后入者”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态度变化不但反映在其意识和言语中,也终将会反映在其行为中。其态度固然是由其内因所决定的,但是外在的因素也是影响其态度的重要因素。从“80后”到“90后”,从高等教育精英化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摆脱生存危机,青年的社会信任始终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008年经济危机后,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即使是在社会制度和机制比较成熟和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了诸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骚乱等事件,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加深,青年作

为社会比较脆弱的群体,其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和经济危机引发的生存危机,导致其对社会既有体系产生“不满”“思变”的社会信任主导了近几年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变革,美国川普现象的出现,德国右翼势力以及台湾台独极端势力通过选举等合法手段进入体制内的立法机构,其主要的支持力量和选票来源是青年人。青年的社会信任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反之又作用于社会层面,落实为社会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发展整体态势和趋势。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同一战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西方的危机^[1],今天的反思更具有一定的指向性。

自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有个性、更加时尚、更会享受成为社会一种新的风尚,在青年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创业的激情和消费的热情代表了一种更加积极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发展趋势,青年成为助推的主要动力。

国内外社会发展态势和青年从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信任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处于社会化重要阶段的青年其社会信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青年政

收稿日期: 2016-10-3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马 峰(1982—),男,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策,把握青年整体发展动态具有指向性。综上,本研究旨在分析城市青年的社会信任现状和基本特征,通过对北京、上海2个城市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迁加快的今日中国社会,我国城市青年人的社会信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从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2个维度,比较研究北京、上海2地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整体特征及差异性,为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水平,改善人际信任关系和提高组织形象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分析

社会信任整体上讲是人们基于现实生活情况和经济情况在一定时间内对自我和社会整体状况的一种内在评价体系,是社会心理的一种表现情况。人际信任关系,特别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而从政府到社会及企业等各种不同组织的信任关系,映衬的是对整体国家发展前途的认知和合法性的来源。它所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自身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态度、意见和预期,是重要的舆论风向标^[2]。就构成而言,它包括对以个体为中心的人际的信任和对国家发展形势为代表的组织的信任^[3]。

(一) 个体为中心的人际信任

从个体为中心的人际信任关系看,我国的人际信任与西方“团体格局”明显不同,是一种以血缘和亲缘为构成的“差序格局”^[4],以己为中心向外推而广之,且具有明显的亲近、远疏关系。而且以“我”为圆心,往外依次是家人连带、熟人连带、弱连带、陌生人,所对应的关系维系原则是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公平法则等^[5],即在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格局中,“己的利益和价值”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进而从“己”拓展到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社会成员间的人际信任,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下,应该是“水圈”的最外层面的东西。实际上,从传统的中国人际格局构成上讲,信任的来源分别是履行角色所赋予的义务、互惠式的人情义务、互助式的奉献义务^[6],即在传统个体为中心的人际信任关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梯度关系,而这种关系模式又跟角色和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以“己”为中心的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关系格局(见图1),而这种格局也可以按照高水平人际信任(奉献、乐于助人)、中等水平人际信任(公平对待别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基本人际信任(周围人可信)、低信任水平(提防别人)和无信任关系(只顾自己)

的结构构成。图1所示的以“己”为中心的关系格局是从一种关系差的角度建构的人际关系,人总是自私的,以“己”为中心结成围绕自己的利益集团,然后向外拓展将利益与亲缘等传统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图1的格局和笔者的见解。社会信任越高则高水平人际信任越高,反之越往圈内则越收缩,人们更注重自己自身及周围人的利益,社会信任水平就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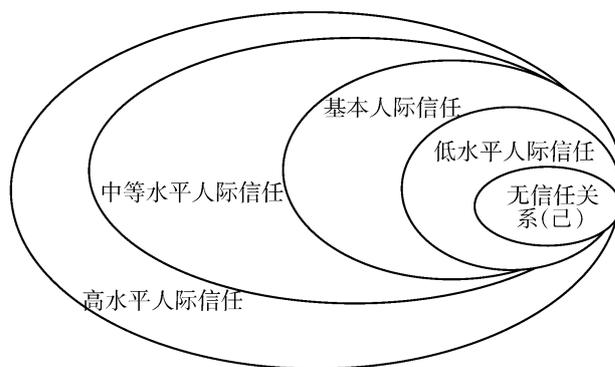


图1 以“己”为中心的人际信任水平构成

实际上,基于上述分析描绘的社会中人际信任关系的水平构成,反映的是“自己人”与“外人”的心理身份的界限,这种界限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信任分类系统^[7]。而传统上,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共同体为主的特殊信任社会^[8],此种社会构成也为人际信任在“差序格局”的背景下,由外而内的延伸奠定了社会和现实的基础。而在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中,也将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看作社会价值观整体变化的重要指标。人际信任水平的高低与物质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偏重于从生存需求、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去建构,而在物质富裕的背景下,这种关系偏向后物质主义的幸福与自我实现,人际信任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预期,经济繁荣的延长会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而经济的衰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9]。欧洲联盟《欧洲2020战略——促进社会融合》公布的人民在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比率(People 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数据显示:经济危机前后社会排斥(孤立和贬低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比率也有明显的变化,危机后的人际排斥比率明显高于危机前,欧元区19国由危机发生前2007年的21.9%,提高到了2014年的23.5%^[10],直接印证了英格尔哈特的相关研究,证实人际信任的关系与社会经济环境、物质基础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

青年人对于这种变化无疑也是比较敏感的,多项研究表明:在经济危机带来的生存危机背景下,青年人对外在人际信任的水平比较低,成员之间对外来人群之间持有某种更直接的排斥心理^[11],从而降低了人际间信任的水平和质量。

实际上,从传统中国人际关系格局和现实的物质变化的影响看,这种对人际间信任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一代代地传递于中国人的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

(二) 社会维度上的组织信任

社会上的组织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从私人的公司组织、公益组织,到政府组织、政党组织,这既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各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媒介手段。在各种组织中,政府组织是社会治理的核心。换句话说,社会信任中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对未来的信心。早在阿尔蒙德进行公民文化研究时,便将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视作组织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帕特南将人际信任、公民参与与社会责任紧密地连接起来,分析政府信任与人际信任在民主参与上的水平^[12]。英格尔哈特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对以经济发展为代表的物质基础变化对人们的政府信任进行了跨国的比较研究,对政府的信任关系与物质基础的变化有直接的关联,存在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的价值观转移^[13-45]。而危机前后,特别是危机后欧洲29岁以下青年人对政府权威尊重的提升^[16],也表明物质基础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变化关系。本文采用组织信任而不采用常用的制度信任,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制度的信任并不代表对组织的信任,组织信任是制度信任的前提,制度是由组织根据其属性建构的,同时组织信任能更好地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探查大学生对不同组织的信任态度,例如同为行政组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信任度在大学生身上就有不同的反应。

青年人的组织信任同样含有物质基础变化的成分,当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公共安全感等评价变低的时候,对社会的整体信任和发展前景就会悲观,组织信任的水平就会降低,相对剥夺感体验强烈的城市其组织信任水平也会下降^[17-48],这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造成的。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家”的理念几乎涵盖了儒家社会的精髓^[19]。

作为中国社会维系的纽带,家、国、天下是一个完整的次序概念,建构起了中国人组织信任的梯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和现实中对社会成员需求的呼吁和“不忘初心”的执政理念,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变增强了对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信任,也从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构成上让“天下太平”“小康”成为今天对政府组织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为核心围绕人大、政府、司法、政协、人民军队、群团组织形成并完善了当代中国公共组织体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每个党员,将党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和青年人身边,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共同成长,这可以直观地映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的水平。

三、数据源及问卷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北上广大学生群体比较研究:就业状况与价值观念》的课题2015年调查资料。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抽样调查在京大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抽样调查在沪大学生。其中,北京抽样调查在校大学生4709名个案,上海抽样调查在校大学生1884名个案,误差为1%,从而为比较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调查基础和分析基础。为比较分析的客观性,在北京4709名个案中随机抽取1884名个案进行比较分析,误差同样为1%。在问卷设计上,围绕中国特色元素(文化、制度)和物质基础变化比较这一成功的研究路径进行了设计。围绕文化的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设计了从高水平人际信任到无信任关系5级问题(见表1),对每个问题的观点,分别从“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不好说”5个维度进行测量,探查大学生在人际信任上的情况。

表1 个体人际信任调查量表

人际信任水平	问题
高水平人际信任	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的
中等水平人际信任	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
基本人际信任	在我周围,当前人们的信任状况还是不错的
低水平人际信任	我和别人交往时会非常小心提防
无信任关系(己)	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另外,在组织信任方面,围绕中国特色的组织体系,从党组织、人大、政府组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协、司法(法院、检察院)、军队、群团组织从很信任、信任、一般、不信任、很不信任5个维度进行测量,分析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组织信任程度及影响因素。选择北京、上海2地做比较研究的原因在于,对城市而言,都是我国公认的一线城市,经济、教育、科技等发达,市场经济、政府治理能力成熟,青年人聚集较多,且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无论从收入、出身、地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可以很好地做好抽样工作。此外,从文化和物质基础构成上,北京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和物质基础构成的关系分析具有典型性,上海开埠百年,海派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经济成分的影响也有代表性,能将传统文化和海派文化在青年人身上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更好地展示出来,并分析其影响机制。

四、北京上海大学生个体为中心人际信任的比较分析

整体上看,上海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各项指标均高于北京大学生的相关指标(见表2)。

此外,有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图2),在整体的置信水平上,前3项迭加,北京、上海大学生整体上人际信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在不考虑收入、阶层、户籍、性别等情况下,无论是高水平人际信任,还是无信任关系,上海高于北京的原因也有其多元性,但主要因素应跟上海的商业氛围、市场氛围浓于北京有较大的关系,使其朝向两级发展。市场经济既是诚信经济,也存在物质至上的问题,这需要靠法治和道德的手段约束。

从整体概况上(见表3),态度大多集中在“不太

表2 京沪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

人际信任水平	地区	均值	标准偏差
高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3.25	1.081
	上海	3.32	1.256
中等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2.91	1.53
	上海	2.98	1.724
基本人际信任	北京	3.36	0.982
	上海	3.39	1.051
低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2.73	1.508
	上海	2.93	1.565
无信任关系(己)	北京	2.62	1.51
	上海	2.87	1.726

同意”和“比较同意”2个方面,持“非常不同意”和“不好说”表述的大学生,2市都没有超过10%,大学生意见相对集中,但在个别态度和人际信任水平上,北京和上海大学生差异性较大。

在以己为中心,无信任关系的人际信任水平上,对“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观点持“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态度的,上海大学生明显高于北京大学生,而“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态度的表达恰恰相反,北京大学生高于上海大学生,这也与上文(表1和图2)所分析的具有一致性,从英格尔哈特物质基础的分析看,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北京和上海在文化历史积淀上的差异性和物质基础导致的物质差异性,如同这2个城市的各自特点,在大学生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

在低水平人际信任上,对“我和别人交往时会非常小心提防”的观点,持“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态度的北京学生高于上海学生;持“比较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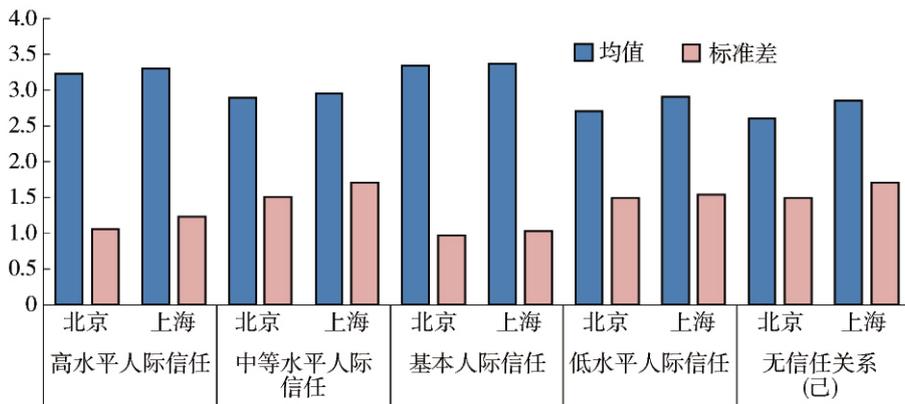


图2 京沪大学生人际信任关系比较

表3 京沪大学生个体为中心人际信任概况

%

人际信任水平	地区	非常不同意	不太同意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不好说
高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2.8	9.6	59.2	24.6	3.1
	上海	2.5	11.1	57.1	23.8	4.9
中等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6.5	35.5	43.8	6.7	6.6
	上海	6.3	39.4	39.5	5	9
基本人际信任	北京	1.4	5	60.1	30	2.7
	上海	2.1	6.6	53.2	34.6	3
低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7.6	47.2	32.2	6.1	5.9
	上海	5.2	40.7	36.8	9.8	6.9
无信任关系(己)	北京	8.5	54.8	25.5	4.5	5.9
	上海	5.7	50.9	28.3	5.5	8.7

和“非常同意”态度的上海学生明显高于北京学生。从整体上看,北京、上海学生持“非常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态度的都较少,大部分集中在“比较同意”和“不太同意”上,北京、上海学生比例相加,87.9%的学生持“不太同意”的态度,69%的学生持“比较同意”的态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大学生的态度呈现较大的分歧状态。但是,大多数还是认为低水平的人际信任还是存在的,而在交往中持“提防别人”的态度,不能说与社会个人信息泄露、诈骗较多没有关系。

在基本人际信任方面,对“在我周围,当前人们的信任状况还是不错的”观点,持“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态度的学生较多,此观点的设置立足点在“我周围”即对周围“熟人”的信任态度,在“比较同意”方面,北京高于上海,在“非常同意”方面上海高于北京,而在“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2个态度上,上海高于北京,再次显示出上海在两端方面的差异性。上海作为经济城市,商业、市场活动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占比较大,在“周围人”之间容易形成一定的经济关系,其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也比较明确,相反,北京这种关系也存在,但相对上海较淡。

在中等水平人际信任方面,当从自己“周围人”推广到“社会人”的层面,对观点“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的态度上,大多数再次集中在了“不太同意”和“比较同意”2个方面,上海大学生在“不太同意”和“比较同意”上比例差距不大,分别为39.4%和39.5%;北京大学生两者之间差距为8.3%,比例较大。对社会上整体的信任状况,可以信任还是不可以信任,两地大学生给出的态度也是

相对的。北京大学生持“比较同意”态度的较高,说明了北京市传统文化环境与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变化之间,对青年人影响的“印记”;而上海学生的态度却相对显示出这座城市和对人影响的“现实性”。在“不太同意”上,上海高于北京,物质基础因素应该占有重要作用,在“比较同意”上,北京高于上海,似乎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高水平人际信任方面,“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的”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理念,更是一种社会成员社会责任的体现,持“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比例的远超其他选择,并且在北京、上海都超过80%,说明当代大学生“心地善良”,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也同样如此。但是整体上,北京持同意态度的比例虽差距不大,但略高于上海。在“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2个态度上,前者北京高于上海,这是让人比较意外的微数据变化,但是似乎也表明了在京大学生受北京环境影响对“乐于助人”标准的高道德要求;后者“不太同意”上海则高于北京,体现的确是上海的“现实”与北京的“纠结”。

在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20]的人际关系中,以“己”为中心拓展到“周围人”“社会人”再到“社会责任人”,从无信任关系的“己”到高水平人际信任,传统人际信任中是越推越薄的(见图1),但是采表1均值做雷达图(见图3)看,在越推越远的过程中,就像水中的波纹,其激起的“涟漪”也是有高有低。大学生在关注“己”利益的同

时,也在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实现着作为“团体人”的社会角色,这或许也是对“西学东渐”百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凝聚起的中华民族意识传承至今,突破传统单一“己”的概念的一种诠释。而作为高水平人际信任的“助人”虽然离“己”越来越远,但却未越来越薄,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正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善”的元素,渗透在物质富裕时代当代大学生的内心和举止行为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性在京沪大学生之间还是略有差异的,特别在无信任关系(己)、低水平人际信任上比较明显,在基本人际信任、中等水平人际信任、高水平人际信任上,略有差距,与表3所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实际上,在从“己”向外的拓展过程中,实际上,物质基础的变化与文化的影响因素,对生活在这2个特大型城市的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很多的微数据,但是所体现的2个城市环境的不同,其所代表的也是南北方文化和环境的不同。自从我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南方的商业氛围、物质基础胜于北方,浓于北方,上海开埠百年最早走向世界,所形成的物质特性和文化特性也与北方有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镌刻在了青年学子的社会化进程中。而北京历史沧桑和历史上北方相对商业文化的淡漠,也让其保留了一份厚重,而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在锻造一个现代化的北京,厚重与现代化折射在一座古城,也让这里的人,特别是青年人有时虽然不明显,但是却多少像今日的北京,有些“纠结”,即在现代化中保有一丝略高于上海的厚重,而上海却拥有一丝高于北京的“现实”。人在城中,城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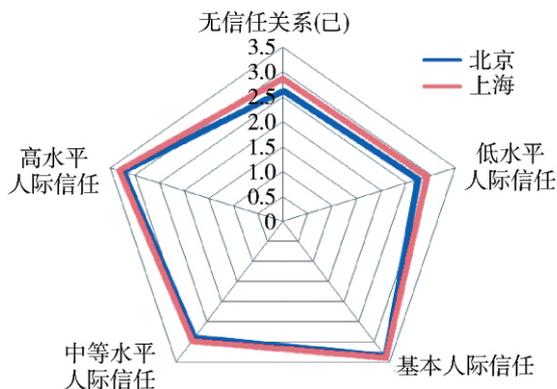


图3 京沪大学生基于均值的人际关系由“己”往外关系

五、北京上海大学生社会维度上的组织信任比较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组织架构如同五星红旗四

颗小星围绕一颗大星展开,是以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依次形成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统一战线组织和群团组织架构。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组织和市场经济组织形式。但是整体的社会治理组织架构还是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权组织体系。京沪大学生对组织信任的概况在整体趋势上保持一致的同时,也存在差异性(见表4)。

表4 京沪大学生组织信任概况 %

组织机关	地区	很信任	信任	一般	不信任	很不信任
党组织	北京	40.6	34.9	20.6	2.2	1.0
	上海	28.3	36.9	30.4	2.5	1.5
人大	北京	36.1	35.9	24.3	2.4	0.6
	上海	25.2	39.4	29.9	3.4	1.5
政协	北京	33.5	35.7	26.8	2.3	0.8
	上海	23.2	38.2	33.0	3.2	1.9
中央政府	北京	43.3	36.5	17.6	1.2	0.7
	上海	29.0	41.7	25.6	2.0	1.1
地方政府	北京	25.1	29.9	36.5	5.4	2.3
	上海	19.5	33.5	38.2	6.3	2.0
法院	北京	32.2	38.5	25.3	2.5	0.8
	上海	24.3	42.3	29.0	2.5	1.3
检察院	北京	32.4	39.2	23.9	2.5	1.1
	上海	23.9	40.9	30.9	2.5	1.2
群团组织	北京	21.1	31.9	39.8	4.9	1.3
	上海	16.2	34.2	42.3	5.4	1.3

总体上看,组织信任水平在京沪2地大学生中明显高于不信任水平,在“一般”这个表态上,上海大学生的比例均高于北京大学生,而在“不信任”和“很不信任”的表态上,上海大学生除个别指标与北京大学生持平,大多数也是超过北京大学生的。在“很信任”的指标上,北京大学生要高于上海大学生,而在“信任”的指标上,上海大学生要高于北京大学生(见图4)。北京大学生持非常肯定的“很信任”的比例较高,上海大学生则相对较低,而持肯定的“信任”和带有一定信任关系态度的“一般”的上海大学生较高,虽然总体上“不信任”和“很不信任”的比例很低,但是上海学生的比例要高于北京学生的比例。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生和上海大学生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即在对组织信任的态度上,北京学生的肯定性要整体高于上海学生,态度的相对模

糊性也低于上海大学生,这也应该与两地的城市特色和氛围有明显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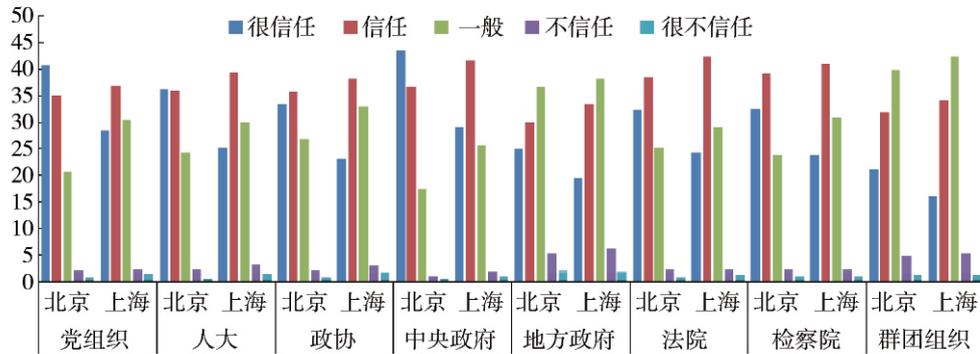


图4 京沪大学生组织信任比较

具体看,从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区分,这种城市特色定位带来的差异性明显的(见表5)。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组织信任关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很信任”的维度上,北京学生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信任差距较大,为18.2%,上海相对较小,为9.5%。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生更肯定地相信中央政府,而对地方政府的组织信任度较低;而上海大学生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信任度维持的差距不大。北京大学生的态度更为鲜明一点。在“很不信任”的维度上,北京大学生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水平高于上海大学生0.3%,在组织信任差距上高0.7%;在“很不信任”中央政府上,上海大学生高于北京大学生0.4%以上,数字整体比例不大,从微数据处理上可以看到,作为首都所具有的独特元素与非首都城市对人影响的差异性。

表5 京沪大学生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任关系比较 %

地区	组织信任	很信任	信任	一般	不信任	很不信任
北京	中央政府	43.3	36.5	17.6	1.2	0.7
北京	地方政府	25.1	29.9	36.5	5.4	2.3
北京	组织信任差距	18.2	6.6	18.9	4.2	1.6
上海	中央政府	29.0	41.7	25.6	2.0	1.1
上海	地方政府	19.5	33.5	38.2	6.3	2.0
上海	组织信任差距	9.5	8.2	12.6	4.3	0.9

在“一般”态度上,北京大学生组织信任差距也超过上海大学生,且两地大学生对地方政府持“一般”信任态度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央政府,这也说明中央政府的高可信度和高支持度。在“信任”的态度上,上海大学生的比例超过北京大学生,正好与

“很信任”相反,这与前文对上海大学生在肯定性上较北京大学生力度较弱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也说明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文化氛围要浓于上海,而上海较强的经济、商业文化氛围也是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北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上海的文化氛围,这种差距对青年人社会化的影响,更具有鲜明的特征。在总体上,持“很信任”态度的大学生北京高于上海,而持“信任”态度的大学生上海高于北京,也可以说明这种特征。

另外,在“一般”“不信任”“很不信任”的维度上,两地大学生比例比较高地集中在了地方政府和群团组织方面,作为与百姓日常接触最多的是地方政府,与青年人接触最多的是群团组织,在大学生的信任度上明显低于其他组织,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将“很信任”“信任”“一般”3个维度的信任状况进行叠加,分别对组织进行排序会发现,京沪大学生的组织信任优先选项既有相同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性(见表6)。

表6 京沪大学生组织信任度整体情况及优先选项 %

排序	北京	比例	上海	比例
1	中央政府	97.4	中央政府	96.3
2	人大	96.3	检察院	95.7
3	党组织	96.1	党组织、法院	95.6
4	法院、政协	96		
5			人大	94.5
6	检察院	95.5	政协	94.4
7	群团组织	92.8	群团组织	92.7
8	地方政府	91.5	地方政府	91.2

前3位的排序中,共同的是中央政府和党组织,最后的排序中共同的是群团组织和地方政府。前3项的排序中,不同的组织北京大学生的选择是人大,而上海大学生的选择是以检察院和法院为主的司法机关。

从共同性上看,整体上党组织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是很高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深入人心,获得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的广泛信任。群团组织和地方政府相对后置的排位和信任度,也跟服务水平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作为普通百姓最直接接触的政府和感受来自地方政府和群团组织,作为直接接触百姓的组织,其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直接影响百姓的信任评价,而大学生无疑是感受较为敏感的。群团组织也需要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①的问题。

从差异性上看,北京大学生信任度高的3个组织在政权架构中属于主要功能组织,政治性功能强于一般的业务性功能组织,再次凸显了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功能作用和作为都城形成的历史文化定位对青年人的影响,即政治氛围浓厚。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首都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上海大学生信任度选择中,以检察院和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占有重要地位,凸显的是业务功能性组织在上海的作用较大。这与上海的经济功能定位具有很大的关系,商业浓厚、市场经济发达对主体之间问题的协调的解决更多依靠业务功能性组织,市场经济作为法

治经济,对司法机关的高信任度也是市场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六、结束语

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构成,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性市场经济因素交叠在一起影响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西学东渐”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并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差序格局”下的人际信任关系在突出以“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的同时,将血缘、亲缘放在重要的位置,相对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因素在现代社会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中影响力还是存在的,以后也不会消失,但是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以社会责任、社会公民为代表的人际信任关系也占有重要的方面。以“己”而推,向外从“周围人”“社会人”到“陌生人”的这层关系虽然存在“提防”的心理,但是以“助人”的公民责任为代表的高水平人际信任,也是中国现代化成绩在社会心理层面的体现。

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中,北京、上海2座城市定位和传统的不同,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其差异性体现在文化因素和物质因素的影响。物质基础的因素和城市经济的定位让上海的大学生对业务性组织的信任相对北京较高,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倾向在中国青年人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中国文化的因素让这种倾向在家庭和为人处世中又回到了传统的发展脉络中,这也算是儒家文明圈的一种共同特性。

参考文献:

- [1] 丁云. 西方文化危机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48-53.
- [2] 王丽萍. 和谐社会建设中城市居民社会信心的发展状况研究[J]. 理论学刊, 2007(12): 72-76.
- [3] 张彦, 魏钦恭, 李汉林. 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概念量表与指数构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4): 64-84.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4-27.
- [5] 罗家德, 叶勇助. 中国人的信任游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6] 杨中芳, 彭泗清.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 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 社会学研究, 1999(2): 1-21.
- [7] 杨宜音. 自己人: 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1999(2): 38-52.
- [8]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9]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M]. 张秀琴,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68.
- [10] EUROSTAT. People 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EB/OL]. (2015-07-12) [2016-11-30]. 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2020_50&language=en.

① 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共青团中央反馈专项巡视情况 http://www.ccdi.gov.cn/yw/201602/t20160203_73930.html 2016-02-04.

- [11] MERKL P H , WEINBERG L. 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nineties [M]. London: Frank Cass ,1997: 26.
- [12] PUTNAM R DM , LEONARDI R , NANETTI R.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nsition in modern ital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3] RONALD I.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4] RONALD I.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5] RONALD I , WELZEL C. Modernization , culture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6]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5 & wave 6: 2005—2009 , world values survey [EB/OL]. (2015-06-30) [2016-11-30].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ONline.jsp>.
- [17] 怀默霆.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J]. 社会学研究 ,2009(1): 96-120.
- [18] 李汉林,魏钦恭.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74-180.
- [19] TU E G , WEI M.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 [M]. Boston: Chengand Tsui Company ,1998.
- [2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6 .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Trus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re Cities of China: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MA F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Institute of Sociology , Beijing 100732 , China)

Abstract: Social trus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judgments and opinions of the social members o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 which is based on the state of the deep consciousness reaction to external things consistent and stable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a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 tru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 urban functional difference , the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 let “city people” in the social trust relationship not only represent the common , but also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 this is a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ibrill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concentr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trust; urban youth; interpersonal trust; organizational trust; post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 刘 健)